

文史資料專刊

政协涿源县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第二期
1986



目 录

一、涞源县建国前教育史简况.....	1
1、明、清两代教育史的记载。功名人数统计和轶闻.....	1
2、“七·七”事变前废科举，兴学校.....	2
3、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校教育.....	6
4、解放战争时期的学校教育.....	8
二、忆察哈尔省“联中”.....	13
三、甲村“少林会”.....	19

涞源县建国前教育史简况

所要写的教育史简况，包括从封建帝制进入历史博物馆，到一九四九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五十年的史料。这一段战争频乃，无论文字史料，还是口碑史料均很贫乏，虽经多方调查，座谈，千方百计地考证，但是，遗漏和问题一定不少。然而“抛砖引玉”在于“抛”，其功在于“引”，故不怕“班门弄斧”之嫌，赘述如下。

一、明、清两代教育史料的记载、功名人数的统计和轶闻

明朝和清朝，除知县外，专管教育的“官”有教谕，有训导。这两个官和现在的文教方面的科局长不能比，他们的俸禄一年只比知县少五两银子。其属下还有门斗三名。相当县学的办事人员。

按现在的叫法有明伦堂、县学、书院、义学、~~学~~童馆（即私塾）。

县学和明伦堂是教谕和训导直接掌管的，其所学书籍除圣谕广训和上谕各一本外，无非是四书、五经，各个朝代略有取舍。

县学的学生：岁贡、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附学生员、礼生等。另外有补廪，补增等名目。除岁贡外，其余各生就是民间所传的“秀才”。县学大~~的~~管辖“秀才”五十多名。生员若考选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则不再是生员，而称为贡生，贡生的名目：明代有岁贡、选贡、恩贡和纳贡；清代有：恩贡、拔贡、岁贡、副贡、优贡和例贡等名称。

大的行政村都由财主一人或数人发起设馆延师授徒，称蒙童馆，后称私塾。有名望的人归里或归隐后，多主持书院，县志载：“霍原隐在大黄（黄）小黄（黄）授徒。徐广云，原隐居广阳山，教授数千人。大小黄岭在县城东北，音讹为大黄、小黄。”

在科举时代，涞源县的教育是比较发达的，按县志的选举表统计：明朝进士一名，举人19名，贡生105名；武进士2名，武举5名。贡生以上有功名者共132名，清朝：没有进士，举人13名，贡生160。武进士1名，武举13名，贡生以上有功名者共187名，总数虽多，但因人口增长，比明朝略落后些，而且无进士，举人也少。有功者总数占全县总人口45469名（同治十三年人数）万分之四多点。

在晚清的贡生中，三甲村徐拔贡是个出名人物，天津市一个商号的大富翁，早年死了儿子，过了些年儿媳也死了，请人写挽联，白发人送黑发人，公公挽儿媳难住了天津的文人墨客，后来请到了正在天津的涞源县三甲村的徐拔贡，写的挽联是：

弱媳久无依，半盏孤灯对只影

亡儿今有伴，一轮明月照双魂

这幅挽联一炮打响，提起徐拔贡天津的文化界人人树大拇指。

二、“七·七”事变前废科举，兴学校

首倡废科举，办学校，当然是“戊戌变法”，是公元1898年。这次变法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是，变法的影响是深远的，六年以后，交通闭塞的涞源县于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创建了“涞源县高等小学堂”。说明那时全国各地已在兴办学校了。

（一）学校的领导机构及小学的一般情况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了。各级学校如雨后春笋，政协常委李延昭同志回忆：“那时办教育的机关是教育局。教育局设局长一人，文牍一人，视学三、四人，炊事员一人。记得起来的教育局长有徐鸿志、马居所等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的教育局长是王守礼。教育局管辖的学校有：县立高等小学堂，女子学校，单级师范等。所谓管辖是指经费由县财务局拨给，是公立学校。各乡村的初级小学，大点的行政村都有。办学经费由村自筹。例如城里在大寺办了一个初级小学校，经费是抽取寺的庙产，也有的村是按户摊派的。教员由村里聘请。月薪五、六元，据现年六十八岁，曹家庄村的孙文达同志回忆说，那时的学生少，我们一百五十来户的村，上学的只三十多人，课程主要是国文和算术。年级高的学生也学“三民主义”。那时家长受旧的影响，让教员开夜校教《百家姓》，《千字文》，谁愿去学谁去。这些事实说明辛亥革命反封建的不彻底性。

（二）涞源县高等小学堂

在“七·七事变”前历史久，培养人才多，影响大的是“涞源县高等小学堂”，创建于1904年，根据是“七·七”事变前所续县志（未来的及印刷）《金石录》中《创建高等小学碑记》，刻着“知县阎骏业撰文，光绪三十年立”。碑文已不全，仅有者：“盖闻山松生岳降山川发神毓之奇兴学育才盛世重文明之化我朝二百年间深仁厚泽文教覃敷一时之硕彦名儒熟业炳当时声华光奕表表者可助道哉弟恐风俗递变士习日偷幕古者纯盗虚声课功者不求实践致

使根底之学愈湮愈没圣天子雅……”。另一个根据是《留别广邑高小记》，碑在此学校大讲堂西内壁嵌（改建家属房时已失），知县叶激撰文，宣统三年（1911年）刻。对此碑和撰文的知县，现年八十六岁的孙杰山同志记忆犹新。

这个学校的地址在现在的人大、政协楼东家属房一带。首任校长是卫介仁，以后贾志蜚，王文德、苏荫桐先后任校长，“七·七”事变时，校长是刘光汉。学校的机构设置：教师、习事（总务）、工友、门房。

学制三年。每年春招生一个班，每班约三十名学生。有时招不够或已过了招生期也设预备班，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止，共招生三十四个班，培养了四百余名人才。

学生编班开始时是天干顺序排列，排到“辛班”，贾志蜚当校长后改用阿拉伯数字顺序排列班次，同时把以前的天干排班也改为数字排班，所以孙捷三同志即是辛班，又是第八班。同时在校的还有五、六、七班，共四个班。孙捷三同志年事已高，但记忆力强，同班三十人，不加思索写出了十六人，与本文有关的几个人是王守礼、王文德、李亲民、辛山……等。

这个学校培养出的学生，有的升入本县单级师范或后来的乡村师范，有的升学保定等外地，很多人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如三十三班的学生现保定专属顾问邹世杰。又如我县共产党的创始人梁振中，以及现省人大主任孙国治等很多很多，勿需赘述。

（三）女子完小和女子师范

女子能和男子一样上学，确非容易。涞源县女子完全小学校，

据现年七十一岁，离休在家的邓玉环同志回忆可能是在她八岁入学那一年（1923年）。校址在现在的检察院及以南十字路北东这一带。校长张元渡，她毕业时也是他当校长，比较一致地说法该校校长始终都是他，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学制六年，教六年级的教师有：刘贺林、齐谢周、齐伟儒、韩珍、潘书琴（女）。一至四年级是复式教学。教师有赵仁。五、六年级分班。五年级在西屋，六年级在北屋。五年级有三十来人，到六年级毕业时人就不多了，大部分是因家庭原因和结婚而辍学。高小的课程：国文、算术、地理、历史、自然、手工。

女子师范可能是为适应女学生继续深造创建的，时间大约是1932年。这一年邓玉环和刘玉恒同时考入女子师范。女子师范的校址和女子完小在一块，只是单立学校名，校长是张元度。学制四年，每年只招一个班，开始这一班只有七、八人。女师也未编班，培养出的人才不多，一九三七年所招的这一班因“七·七事变”未能毕业。梁正平（梁振中妹），王玉配（宋廉妻）李福俊都因事变停学。

（四）单级师范和乡村师范

师范是涞源的最高学府，最初为培养师资，于一九一七年一月创办“教师讲习解”。地址在文庙西北角的“明伦堂”。“明伦堂”在现在的科协车库前后，大槐林西北。“校长张明敦，每期招生20名，学制为一年，至一九一九年共招收三期学生。”“一九二〇年二月改为单级师范”。现年八十一岁的杜奎章同志是1924年初考入单级师范的。校长仍是张明敦，每期招生40名，学制二年，这期毕

业后再招一下期所以叫单级师范，只有一个年级。一九二六年二月改为“乡村师范”，从一九三一年杜奎章同志在此任教，校长先是王文德、后是张银奎，学制三年，每期招收学生40名。课程：除单级师范时的算术、国文、历史、地理、教学法、管理法、音、体、美外增设了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乡村教育和西洋教育史等课程。1933年又改名为简易师范，至七·七事变时校长是苏荫桐。这次更名，有两项改革，一是学制改为四年，二是招生男女兼收，一九三七年初招的学生都因“七·七事变”未能毕业，各奔前程，其中有不少人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校教育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涞源。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反侵略，涞源城四次得而复失。但是，共产党对教育工作始终紧抓不放，一九三七年冬县政府成立，立即招聘小学教员，开始了在特殊条件下，艰苦的教育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涞源县分为抗日根据地（主要包括原二、三区片、现在的六个乡）、游击地区和敌占区（主要是县城周围，及主要交通干线的点线地区）三种情况。在抗日战争进展的三个阶段，这三个区域有扩大缩小的变化，基本形势是这样划分。但是，所谓根据地也被敌“扫荡”，所谓“敌占区”也不断地被我游击。在这样的形势下的学校教育，也必带着抗战和游击的彩色。

1、小学。抗日初期，敌人还未侵入农村，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冬抗日县政府招考小学教员后，第二年春大部分乡村小学还能办学，这时抗日政府县长王裴然。王天放同志被分配到五区土巷口当

小学教员。区长是顾景荣。教员工资是村里给。当时花察哈尔币，每月工资十三元，能买五六斗米，能够正常上课。一九三八年秋后，日本鬼子又占了县城，距县城近的学校大部分停办，教员也回了家。

抗日时期的巩固根据地，教师大部分一身数职，除领着学生搞抗日宣传外即是教师，又是村里的文书。那时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辛宝地在独山城的沙果园教小学，白天教小学，晚上教业校，又负责成人扫盲，他自称办一揽子学校。被评为全县的模范教师。那时抗日工作人员的家属子女在家不能呆了，有不少也跟到根据地去，在根据地上学，孙宝珠同志就是随父到根据地上学的，当时他十一岁，是一九四一年，在杏树台的石潭庄上小学，边区油印的课本极缺，他的课本是区教育助理员赵良给抄的，一年里正式上课的时间不多，经常跟着反扫荡，特别是秋季反“扫荡”完全停课，跟着打游击。

在游击区，小学就更比较艰苦。课本是两套，教师教抗日政府油印的课本，还要有《百家姓》，《千字文》作掩护，必须找一个秘密地方坚壁课本，日本鬼子来了提前坚壁。那时王占同志被抓，就是因为没来得及掩藏抗日课本。群众很苦，给教育的待遇也很低，每月只能给四十多斤米维持生活。

在敌占区，日本侵略者在县城搞奴化教育，让学生学日语，唱日语歌。进行文化侵略。在县城以外的敌占区，教员和家长反抗奴化教育，大部分停学停课，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2、第一完小的巩固发展和第二完小的建立

一九三八年收复涞源城后，抗日政府号召原县立高等小学的学生复课。校名改为恢复高小。校长刘光汉，原来的学生有的回来了，有些没有回来，没有全部到校，学生配合抗日宣传是一项主要社会活动，文艺队长邹世杰同志带领同学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老同志中影响很深。

一九三九年初抗日政府建立了涞源县第一完小。校址有的说是在高家台，校长马丁。有些老同志记不清了。从高家台何时迁到二区的岭子背的？有的说最晚在一九四一年，孙宝珠同志说：“在我四二年考入第一完小前，完小就在岭子背。这时的校长是史梦南（女）。当时两个年级学生共四、五十人。大约于一九四三年第一完小迁到北城子，直到抗战胜利，校长接替是马丁——史梦南——马丁——马荣庭——孟斌。

所谓完小，其实主要讲的是高小，有五、六两个年级，课本是油印的。平时比较正常上课，到反扫荡时，基本停课，跟着转移，反扫荡。例如一九四三年日本鬼子秋季扫荡，进入了南、北城子，第一完小随县政府到了燕窝村。基本上停了课学生参加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参加公审会，镇压汉奸等活动。

第一完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涞源县教育史的丰碑。

抽调教师建立第二完小，也是第一完小的一大贡献。一九四四年春，将第一完小的教师翟贵森抽调到鲍家路，当年招生开学。这个完小一直办到改为初中止。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学校教育

为叙述方便，本文所说的解放战争时期是从日寇投降前，1945年春天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止。

（一）小学教育概况

一九四五年日寇慑于抗日战争的压力，先龟缩在公路干线的据点、炮楼，后匆忙撤走，抗战胜利了，县政府回到县城，在百废待举之时，首先抓教育，停学数年的敌占区小学都恢复起来了，（四五年初教育科长孙铁儒）教师有村里聘请的，也有上级给分配的，课本，开始几个月来不及解决，先让学生学《百家姓》等旧书。第二年有了铅印的课本，但很不完全。土政前小学有两大特点，在初期学生的年龄大，十六、七，甚至十八、九的学生入了学，有扫盲和速成小学的性质，一直到土改；另一个持点是学生做宣传工作很多，跳秧歌午，打霸王鞭，唱革命歌曲。当然学校后来也做宣传工作，但比“土改”前少得多了。这一时期特别是初期尽管学习条件艰苦，教师实行供给制。但是各行政村都有了小学，学生的入学率和教学质量在逐年提高，由初期的百分之二、三十到建国前达到百分之七、八十，小学教育一片欣欣向荣。一九四六年在西关办小学教师的训练班时，王天放同志被选为涞源县小学教师联合会主席。

（二）四所完小的简况

第一完小（北城子），继续巩固发展，第二完小（鲍家路）于一九四四年创建后，于一九四八年迁到五十亩地，校长首任是翟贵森，续任是高×，第三任是武万深，他把学校迁到五十亩地，龙中田同志去接他的任时是在五十亩地。一九五一年龙中田同志调县教育科，王占同志任第二完小校长，后来王占同志将第二完小迁到了

王安镇，直至五十年代改为中学。

第三完小是一九四五年春创建的，首任校长是高广桂，地址在现一中，东关小学是其附属小学。第三完小的续任校长是张政同志。一九四七年土改前迁到现教育局址，校长先是张致同志，张致当教育科长后是王天放同志。到1948年10月涞源师范成立，第三完小成了附属小学。第三完小创建初期，有不少从根据地来的第一完小的抗日工作人员子女，他们有“抗大”作风。一九四六年秋，有三个班的学生，六年级和孙宝珠同志同班的有李金龙、张一民、张铭儿等二十儿人。孙宝珠同志是学生会主席。由学生会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和学生纪律。那时有一个说法，叫做学生自己管理自己。

第四完小，实际上前后有两处。第一个是一九四五年建立的，地点在北石佛，稍晚于第三完小，校长是孟憾，接着是苏荫桐，有两个班，校名也叫北石佛高小。

这个四完小有一大贡献。一九四六年张垣失守前，北岳行署党政群团的领导机关撤到涞源，领导干部的子女有专区党委书记的儿子，有边区教育处处长刘凯丰的两个女儿等三十余人也随父母到了涞源。第四完小接纳了这批学生，他（她）们在这里学习近三个月，然后又随父母转移了。这批学生曾在延安上过学，政治觉悟较高，他们选出学生代表，自己管理自己，管生活纪律，管伙房，管宿舍。实行军事化，每人一个毡子，一条被子，完全轻装，还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自己管自己的能力和个别同学的会挑皮给当时在这里当教师的龙中田同志印象很深。

在北石佛的第四完小于一九四七年底合并到第三完小（地址在

上关)

一九四八年底中庄建立了一个完小，又排为四完小。初建是一个班，校长梁琪，接着是李博渊，大约在一九五〇年搬到了上庄，校长仍是他。

(三) 察哈尔师范涞源班和涞源师范的创建

张垣失守前迁到吉河的察哈尔师范，为给涞源培养师资，一九四七年初，增设了一个短师班，招生对象只限涞源，共招收学生三十多名。课程按初中课程进行，仅坚持了三个月，因解放战争的需要，学校掀起了参军热潮，年龄大些的男女同学大部分报名参军，投笔从戎。如马庄的胡希哲，北石佛的马四顺等，后来都担负了相当的军政重任。短师班完成了历史使命。

涞源师范创造于一九四八年八月，招收学生50名，为涞源师范第一班，校址在现教育局。一九四七年冬，张垣失守，北岳行署战略转移到涞源，行署教育厅厅长李树森同志主持召开北岳区中等学校校长会议，有几个县的代表参加，因当时我县没有中等学校。县委派王天放同志以第三完小校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会后，根据李树森同志的建议县委研究同意由王天放同志负责筹建涞源师范。招生开学后由马丁同志兼任校长，王天放同志任副校长，马丁同志南下，教育科长张政同志兼任校长，王天放同志仍是副校长。路锡光同志来任校长已是一九五〇年了。

(四) 察哈尔省“联中”在涞源，是涞源人民的贡献

察哈尔省“联中”是察哈尔联合中学的简称。一九四六年秋，宣化师范，宣化中学，途经蔚县，后到东团堡休息整编。由宣师和

宣中抽调师生组建了一所新学校——察省行政干部学校。三所学校一起南下经北城子，然后爬山越岭到老根据地二区，察师驻吉河、察中驻岭子背、行政干校驻司格庄。一九四七年夏，这三所学校和五专署师范一起云集到洮源城郊的前泉坊、后泉坊，四所学校五百多人联合起来组建成“察哈尔省”联合中学，校长武树璠。校部，伙房在前泉坊，后泉坊村头马路边的大庙成为露天礼堂，马路当操场。一九四九年二月，“联中”全体师生，告别了驻扎四个年头的洮源步行七天，迁到张家口，改称张家口中学，联中在洮源走完了自己的历程。洮源人民为察哈尔省教育事业的贡献将永载史册，熠熠发光。

附记：

1、执笔人：孙保华

2、史料调查收集：李清、孙保华、韩宏祥、阎继增、王志新、李默求、靳春阳、刘振芳

3、提供文字资料者：教育局函授学校、李延昭、贾一民、王栋。

4、参加座谈和提供口碑资料者：李礼、张宏典、辛一天、杨耀森、孙田、杨云龙、李华、郭石岭、孙宝珠、孙捷三、贾步礼、郝民庭、杜奎章、邓玉环、刘玉恒、龙中田、王天放等。

一九八六年六月

忆 察 哈 尔 省 “ 联 中 ” 廖一民

在“联中”建校四十周年之际回忆“联中”的往事，历历在目，师生们，克服艰难困苦为革命学习的精神跃然纸上。

“联中”是“察哈尔省联合中学”的简称。（洮源县当时属晋察冀边区，察哈尔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察哈尔省解放区的最高学府，一九四六年秋来到我县的深山区银坊地区的吉河、领子背、司格庄小学。经历了四个年头。四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但她是革命的浪花，她肥沃了洮源的土地，孕育了不少革命和建设的人才。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宣化，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为了及时培养人才，宣化中学和宣化师范，都从新、老解放区招生。我县第一完小和第三完小的学生：邹金昌、邹家珍、胡朋、胡萍、孙宝珠，刘度等不少同学，远离家乡，长途跋涉，先后考入了宣化师范和宣化中学，成为察省“联中”前身的学生。

四六年秋，在张垣，宣化失守前，宣师、宣中全体师生，背着行装，挎着书包随着党政机关，一同进行战略转移；有的同学还带着枪枝，抬着脚踏风琴，背着二胡手风琴等乐器，冒着敌机的拦截轰炸，顶风冒雨，日夜兼程，跋涉数百里，伴随着千里归雁，头顶碧云蓝天，脚踏黄花地，浩浩荡荡经过蔚县来到我县东团堡，驻足休息整编。经过七天休整，由两个学校抽调师生组健

了第三所学校——察省行政干部学校。校长高振德。（抗战时曾任涞源县县长）师范校长武树藩，中学校长王绍文。三位校长都是专员级的干部。表现了历来党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从东团堡到了北城子稍事休息后，三个学校，很快从北城子村，翻过走马驿的东山——石鸡梁，鞍子岭，进驻二区（现在的银坊区。察师驻吉河村，察中驻岭子背，干校住司格庄。巍峨的白石山，敞开了她的阔大胸怀，用甘泉乳汁，哺育着这群时代的骄子。

三个学校立足白石山下：校舍是山庄的茅房，山沟小叉当课堂，石头是桌椅，沙滩是操场。在这样的条件下，艰苦的学习，四六年底，三个省立学校同时招收新生。四面八方的考生，云集白石山下。当时我才读到小学五年级，没等毕业，便约了两个六年级大些的同学，离开第一完小，背着行李背包，踏着省校的足迹，找到了吉河，去投考师范。考生随到随考，学校安排免费食宿。我的卷子答的很不理想，然而三个同去的考生，我却成了唯一的被录取者。原因：可能是我年岁小，衣着破烂，填表是贫农，给予照顾。察师，是后来组成联中的主力。从宣化来的学生为五个班，四六年底在吉河新招两个班，多为完、唐、满、易，涞水等县的学生，也有曲阳、阜平、平山、灵寿等石家庄地区学生。校址所在的涞源县学生人数甚少。

四七年初，学校为给涞源县培养师资，增设了一个短师班。只从涞源县内招考学生。共招收学生三十多名，在察师，涞源生的比数上升了。课程按初中课进行。没有课本，全靠老师编印讲议。教室是河滩、树林，宿舍里是地铺油灯，白天上课，晚上讨论，学

习都很认真。

学校经费困难，但是老师们不少人来自延安，保持着延安作风和南泥湾精神。用“自力更生”来解决学校和学生的一切费用。学生分成生产班组，做豆付，生豆芽，打柴禾，纺棉线。即供伙房食用，个人也得点收入，作为上学的费用。比如我，一个十三岁的男孩，用纺线，生豆芽挣来的钱拉了几尺粗白布，用杏树根煮成几种浅黄色，虽不太悦目，但爬在黄土地上却是一种天然的保护色。班主任王乃林（女）老师，帮我裁剪成衣、教给如何缝制，两天时间，小褂子做成了。领子和袖子都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上，只是扣眼按照扣子的形状大小，剜成了一溜圆圆的眼睛，扣子出入随便，毫无阻拦，成为班上的趣闻笑料。

吉河，一个不到百十户人家的小山庄，容纳了一个三、四百人的省立学校，终日不断的回荡着欢乐的歌声。每逢节日都有文艺晚会。师生同台，学民共赏。歌午，戏剧，声情并茂。脚踏琴，手风琴的出现，此时此地，使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在这里，召开过一次内容新颖的庆祝大会：学校选出了五户模范房东。她（他）们对住在自己家里的学生，都象亲人关怀备至。只记得有一户叫张文彬，领到一双实纳帮底的布鞋，是当时得到的最高奖赏。

四七年春，全国解放战争处在关键时刻。前方缺乏人才，学校大力输送。全校掀起参军热潮。年令大些的男女同学，大部奔向前线。短师班也就短短的三个月完成了她的使命，全部投笔从戎。马庄的胡希哲，北石佛的马四顺等人，后来都担负了相当的军政要